

從《思與言》、《食貨月刊》、《史學評論》、和《新史學》 的發刊辭側看戰後臺灣史學

藍元鴻*

摘要

1964年創刊的《思與言》¹與《食貨月刊》²、《史學評論》³和《新史學》⁴是臺灣史學界重要的刊物，把它們的發刊文聯繫起來綜合比較能看出戰後臺灣史學精神風貌的承先啟後。四份刊物的辦刊主題⁵各有不同，然而從發刊文來看它們的治史精神上卻是如出一轍。1979年7月發刊《史學評論》的精神風貌部分繼承於陶希聖先生在1934年12月1日創刊的《食貨》半月刊，而後來1990年出版的《新史學》則是接續了兩份刊物精神遺址⁶。錢穆先生1941年發表的《新時代與新學術》⁷一文幾乎預見臺灣戰後50年來史學發展過程的展望與瓶頸。史學是以時代發展為主軸的學問，對時代的變化比其他學科更為敏感⁸。中西學術差異的碰擊和融合的過程在近代史學史是有明顯的對應。中國近代史學的發展主要取法西學而來，直到現今仍有如何妥善轉化歐美學問的徬徨。若把這四份學術刊物進行一個多角度的綜合、分析和對比，顯

* 東海大學中文系四年級

¹ 本社，〈思與言(代發刊詞)〉，《思與言》，思與言雜誌社印行，台北，1963年2月15日，創刊號，頁3。

² 陶希聖，〈食貨復刊辭〉，《食貨月刊》，食貨月刊社出版，台北，1971年4月15日，復刊第一卷第一期，頁1。

³ 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代發刊辭〉，《史學評論》，史學評論社編，史學評論社印行，台北，1979年，第一期，頁1-24。

⁴ 本社，〈發刊詞〉，《新史學》，新史學雜誌社編輯委員會編，三民書局出版，台北，1990年3月，頁1-3。

⁵ 《食貨月刊》和《思與言》著重在鼓吹社會經濟史和史論的部份；《史學評論》是著重在以社會科學治史而《新史學》則較綜合持平廣納稿源。

⁶ 《史學評論》的編輯群來自於1971年4月5日在臺復刊的《食貨月刊》，而《史學評論》原來的編輯群在《史學評論》停刊後便轉移至《新史學》。《食貨月刊》和《史學評論》歷來刊登一系列文章作者進行對比會發覺兩刊有共同的「常客」。而1990年3月創刊的《新史學》第一期刊載的《新史學》基金贊助名單上的本刊發起人名錄，便是有《食貨月刊》和《史學評論》的成員。從這三份期刊的創刊辭和作者群的簡單對比，便能確立它們之間的關係。

⁷ 錢穆，〈新時代與新學術〉，《文化與教育》，1971，台北市：仙人掌出版社，頁55-62。

⁸ 〈發刊詞〉，《新史學》，1990年3月，頁1。

然是能凸顯出臺灣史學在 1945 年至 1990 年代對歐美學術觀念和方法的吸收、消化的漸變過程，還有學術與政治議題的變遷。由於字數、篇幅有限便以四份期刊的發刊辭畫為焦點側看戰後臺灣史學的進展。

關鍵字：臺灣史學，發刊辭，發展過程，勢

一、前言

1948 年 12 月 22 日，史語所和數學所隨著台北故宮第一批文物箱件由海軍載運駛離南京，抵達基隆⁹。從那年的 12 月 22 日起，臺灣接續了中國近代史學的傳承與發展，為世界學術史增添新的一頁。隨著國民政府遷臺的外省學人群中的史學研究者以傅斯年為首，臺灣當時史學的研究、教育便幾乎落在史語所的學人身上。史料學派因此一開始便在臺灣的重要學術機關任職而有深厚的影響力，造成除了史料學派便幾乎沒什麼其它的學派具有影響力，畢竟為數很多的學人仍滯留在中國大陸。隨著臺灣的政局藉著威權體制的壓力漸漸平定，國內大學畢業的優秀學人陸續留美深造、回臺研究¹⁰，留美的新一代臺灣學人漸漸地扭轉戰後臺灣的學術界，乃至政治的格局¹¹。

許倬雲先生在他的文集《心路歷程》¹²的自序中談及他在 1957 年留美歸國時的幾段心情敘述，幾乎是那時臺灣知識分子的心情側寫¹³。20 世紀初

⁹ 「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 80 年」數位典藏特展 <http://archives.sinica.edu.tw/80th/index.html>(時間：0837、日期：21-11-2010)。

¹⁰ 余英時先生在〈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一文中曾談及「五十年代中葉後，臺灣和香港中國文史界的學人和學生開始到美國進修」，《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1991，臺北市：三民出版社，頁 179。

¹¹ 臺灣的黨外民主運動便是以在美留學的臺灣留學生為主幹力量。

¹² 文中的幾段文字，如「我們這一代，是充滿了困惑與迷惘的世代。正在發展的經濟條件下，我們却看見無數不得發展機會的青年。一團低氣壓，壓得許多人想要扯破衣襟」、「我們要改變的是制度與結構，因此我們要批評觀念，建議提出新觀念」和「我們正在一切急劇轉變的中間」。許倬雲先生在文中不斷提及「期待」、「提出」和「改變」等字眼，從中側看出 60、70 年代臺灣知識分子於外任政治、社會環境中苦悶中思變、求變的心情。許倬雲，《心路歷程·自序》，1979 年，台北市：傳記文學出版，頁 1-10。

¹³ 1945 年以後國共內戰的爆發，使得排斥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流亡至港臺或海外各處。1948 年隨國民黨流亡至臺灣的外省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基本就體現在 1950 年代至 1980 年代的學術研究和風氣上。「這批流亡港臺與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延續五四以來的思想潮流，提倡啟蒙救亡的思維與價值觀」。許順昇，〈流亡世代的政治構思：《民主評論》的國家論述（1949-1966）〉，東海大學歷史系研究所碩

年開始，梁啟超等人提倡的「新史學」希望通過揭示歷史上人與事的「因果關係」而把史學弄得更「科學」¹⁴。1963年的《思與言》在創刊號的代發刊詞中提及的「進步的力量」、「運用科學的方法來分析思考」和「所追求的惟有理性」等字眼便是企圖於學術能「科學化」以濟時代、社會的表現。而至20世紀中葉以後的臺灣新一代受過西方學術訓練，能流利使用英語的史學工作者更進一步的把在國外所習得的社會科學理論引進戰後臺灣的史學領域。1971年的《食貨復刊辭》接著提出「促使中國歷史學從文學家的筆下走進社會科學的講壇之上」，便是自然而然的事。

戰後臺灣的史學風氣很大的程度上是受歐美學界的影響¹⁵，從70年代後期特別是80年代起，以人類學思想思路為基礎的「文化史」取向便逐漸風靡美國¹⁶，而臺灣也有了類似的現象--畢竟年輕的研究員、學人多有留美的背景¹⁷。1950至1960年代初期有效促進臺灣經濟安定最重要的外在因素，是來自美國的經濟援助¹⁸。外在社會結構即已佈滿美元的影響，在學術上的風氣自也難逃美方的影響了¹⁹。林正珍女士指出「無可置疑地，臺灣在過去

士論文，2009，頁2。

¹⁴羅志田，〈見之於行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近代中國史學十論》，2003，上海市：復旦大學出版，頁258。

¹⁵王晴佳在《當代台灣歷史論述的雙重挑戰》一文中指出「在戰後的幾十年中，由於冷戰的持續，中國大陸的封閉，使得台灣成為西方學者研究中國的基地……因此從1960年代以來，台灣史學界與西方史學界，便保持一種幾乎同步的互動。1960年代中期以後，在西方史學界社會史、或社學科學史研究的影響下，台灣史學界中亦興起社會經濟史研究的熱潮，便是一例。而到了1980年代，由法國年鑑學派中間出現的文化史，亦主導了台灣史學的新趨向。與前一時期一樣，留學歐美的學者在溝通台灣和西方史學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當代台灣歷史論述的雙重挑戰〉刊登在《思想》，2期，2006年9月1日，頁98。

¹⁶羅志田，〈音樂與史學：晚清學術的多旋律並進〉，《近代中國史學十論》，2003，上海市：復旦大學出版，頁60。

¹⁷1965年7月，美國停止對臺的經濟援助。美方對臺的經援共有十五年，總計援助了十五億美元。這一批的金援即流向了臺灣的基礎建設、國防等等的地方，其中也流向了學術機構。美國金援對臺的具體影響，我不曾詳細的查閱資料。以上的數據是參考自薛化元先生編著的《臺灣開發史》（臺北市：三民出版，1999）。不過，從因著庚子賠款而建立的清華大學(Tsinghua University, THU)的最初「政治用意」延伸來看，美國多少是會介入臺灣的學術機構，以便維護其在臺灣、東亞地區的利益。

¹⁸薛化元編著，《臺灣開發史》，1999，臺北市：三民出版社，頁176。

¹⁹事實上，1966年臺灣學術界便和美國學術界在籌畫全面合作。據許倬雲，〈漢學

學習西方史學所形成的某些支配性理論，是造成史學發展陷入瓶頸的結果，而隨著這一知識社群的擴大，更牢固了這一『認知』價值」²⁰1979年，余英時先生為《史學評論》所寫的代發刊辭便有著平衡、緩衝史學一開始欲使利用社會科學而發展至迷信社會科學理論方法的現象，而指出「問題或大或小，工作的性質或偏重分析或偏重綜合，都和作品的價值無直接關係。史學作品的價值最後還是為它本身的學術品質所決定的。」²¹可是，1990年發刊的《新史學》發刊詞中似乎仍有迷信「形式」的問題²²。

1964年創刊、發行的《思與言》與《食貨月刊》(1971年)、《史學評論》(1979年)和《新史學》(1990年)是臺灣史學界重要的刊物，收錄、刊登的文章在研究面向和方法上多以制度、經濟和外交等現象面著手傳統的史料與社會政治的關係。四份刊物所刊登文章依年序排開從中應該是可見出--西方社學科學的理論運用從1963年代的《思與言》至《新史學》漸漸成熟的過程。四份刊物的辦刊主題各有不同，然而從發刊文來看它們的治史精神上卻是如出一轍。1979年7月發刊《史學評論》的精神風貌部分繼承於陶希聖先生在1934年12月1日創刊的《食貨》半月刊，而後來1990年出版的《新史學》則是接續了兩份刊物精神遺址。史學是以時代發展為主軸的學問，對時代的變化比其他學科更為敏感²³。中西學術差異的碰擊和融合的過程在近代史學史是有明顯的對應。中國近代史學的發展主要取法西學而來，至到現今仍有如何妥善轉化歐美學問的徬徨。若把這四份學術刊物進行一個多角度的綜合、分析和對比，顯然是能凸顯出臺灣史學在1945年至1990年代對歐美學術觀念和方法的吸收、消化的漸變過程，還有學術與政治議題的變遷。

中心二十年慶--回顧與前瞻》，《漢學研究通訊》，20卷3期，2001年8月，頁1-2。

²⁰林正珍，〈臺灣五十年來「史學理論」的變遷與發展：一九五〇～二〇〇〇〉，《漢學研究通訊》，20卷4期，2001年11月，頁7。

²¹余英時在〈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代發刊辭〉的頁11至22便對整體的史學在追求科學化的發展過程中的利與弊進行疏通，進而提出「史無定法」和「史學研究是一種具體而踏實的工作」的勸告。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代發刊辭〉，《史學評論》，史學評論社編，史學評論社印行，台北，1979年，第一期，頁1-24。

²²「近人喜以『形式』衡量新舊，譬如說採取某某方法的研究謂之新，否則為舊；運用某某觀念的著述謂之新，否則亦為舊。」〈發刊詞〉，《新史學》，頁3。

²³〈發刊詞〉，《新史學》，頁1。

至今為止已有不少歷史工作者整理出相關歷史的反省文章，如黃俊傑先生在 1983 年發表的〈戰後臺灣關於史學方法論的研究(1950-1980)〉²⁴、林正珍女士的〈臺灣五十年來「史學理論」的變遷與發展：1950~2000〉²⁵和王晴佳女士的〈臺灣史學的「變」與「不變」：1949-1999 年〉²⁶等優秀篇章。筆者是在偶然的情形下注意到這四份期刊的發刊詞有著變化、連續的內在聯繫。由於目前的學識尚淺和九千餘字的白話文章尚屬通論性質，難免易於把文獻與問題的複雜給予簡略化了。雖然為文較為簡略，但期望的是能以簡馭繁，在一個大方向上為往後的學術增添一點微薄的貢獻。

二、簡析四份創刊辭共同觀點的變化：從急切到篤定的發展

中國近代的喪權辱國和文化思想上的劇烈變動²⁷，使得中國智識分子紛紛尋求富國自強的方策。史學在這時代氛圍中的變動、發展²⁸，和知識分子面對西方文化勢力的入侵和學術的挑戰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錢穆說過：「變亂之際，學問尚關。其時學者內本於性格之激盪，外感於時勢之需要，常能從自性自格創闢一種新學問，走上一條新路徑，以救時代之窮乏，而對於前人學術成規，往往有所不守。此種新學術，常帶粗枝大葉蒙屬生動之概。前者大體乃以學問為出發點而使用學者。後者大體則是以學者為出發點而使用學問」²⁹錢穆先生的這一番話，拿來對比這四份發刊辭中對史學懷有的問題與展望敘述是貼切的。

四份刊物的辦刊主題³⁰各有不同，然而從發刊文來看它們的治史精神上

²⁴黃俊傑，〈戰後臺灣關於史學方法論的研究(1950-1980)〉，《戰後臺灣的教育與思想》，1983，臺北：東大書局，頁 29-99。

²⁵林正珍，〈臺灣五十年來「史學理論」的變遷與發展：一九五〇～二〇〇〇〉，《漢學研究通訊》，20 卷 4 期，2001 年 11 月，頁 6-17。

²⁶王晴佳，〈臺灣史學的「變」與「不變」：1949-1999 年〉，《臺大歷史學報》，24 期，1999 年 12 月，頁 329-374。

²⁷余英時便在《猶記風吹水上鱗》說過「中國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個激進化的過程(process of radicalization)」，《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1991，臺北市：三民出版社，頁 214。

²⁸「國故和國學並非由中國傳統的詞彙而來；二者皆西方文化入侵中國之反應和西化問題發生以後只結果。」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著/梅寅生譯，《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1984，台北市：華世出版，頁 38。

²⁹錢穆，〈新時代與新學術〉，《文化與教育》，1971，台北市：仙人掌出版社，頁 55。

³⁰《食貨月刊》和《思與言》著重在鼓吹社會經濟史和史論的部份；《史學評論》是著重在以社會科學治史，而《新史學》則較綜合持平廣納稿源。

卻是如出一轍。1979 年 7 月發刊《史學評論》的精神風貌部分繼承於陶希聖先生在 1934 年 12 月 1 日於中國大陸創刊的《食貨》半月刊，而後來 1990 年出版的《新史學》則是接續了兩份刊物精神遺址³¹。四份期刊的發刊文(發刊詞、發刊辭)分別橫跨 60、70 和 80 年代，表現出史學面對西方學術的一個明顯特徵是如何對西方的學術(尤其社會科學的部份)的取捨、運用以及熱切以學術救國、救時弊的動機。四份的發刊文按年代的排列展現出臺灣史學從逐步接受或是抗拒西方的社會科學，至仍擺脫不開再調適與完融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過程。

1960 年代的《思與言》在發刊辭中強調「就社會科學的範圍，作純理論的探究」，《食貨月刊》的陶希聖則是繼續提及拓寬、發展中國歷史與社會科學³²。《史學評論》的發刊文中，余英時等學人開始極欲疏通史學在科學化³³(也就是脫離舊有的傳統學問形式)過程中的衝突、利與弊以及提出解決之道。到了 1990 年的《新史學》則暴露出史學的發展仍舊未能走出一條康莊大道，而再次鼓吹欲以一種以前瞻、開放、嘗試的態度研究中國歷史的觀點。

陶希聖在《食貨月刊》的復刊辭中寫道「我有一種志願與企圖，要採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向歷史探求中國社會演變的軌跡，以印證並解答現代中國的問題……」³⁴。陶希聖親身經歷過北伐³⁵而對中國的時局有切身的感受，〈食貨復刊辭〉中那句「解答現代中國的問題」無疑是近代學術界的一流知識分子的心聲³⁶，也就是錢穆在〈新時代與新學術〉一文中所言

³¹《史學評論》的編輯群來自於 1971 年 4 月 5 日在臺復刊的《食貨半月刊》，而《史學評論》原來的編輯群在《史學評論》停刊後便轉移至《新史學》。《食貨半月刊》和《史學評論》歷來刊登一系列文章作者進行對比會發覺兩刊有共同的「常客」。而 1990 年 3 月創刊的《新史學》第一期刊載的《新史學》基金贊助名單上的本刊發起人名錄，便是有《食貨半月刊》和《史學評論》的成員。從這三份期刊的創刊辭和作者群的簡單對比，便能確立它們之間的關係。

³²「歷史學的理論和方法不止一端。而採用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以致力中國歷史及社會研究的道路，迫切需要我們再拓寬，再延長。」〈食貨復刊辭〉，頁 1。

³³「就思想的淵源言，史料學派和史觀學派分別地代表了近代史學追求科學化的兩個途徑。」〈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代發刊辭〉，頁 11。

³⁴〈食貨復刊辭〉，《食貨月刊》，1971 年 4 月 5 日，復刊第一卷第一期，頁 1。

³⁵陶希聖在復刊文中寫到：「民國十三年至十六年，北伐的革命怒潮沖洗了中國……我親眼看見且親身經歷社會結構普遍強烈的變動。」

³⁶余英時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創世紀〉一文中指出「中國知識分子對道德、政治、

「以學者為出發點而使用學問」³⁷。《思與言》發刊文中指「惟有學術才是社會進步的動力」和余英時及《史學評論》的骨幹們在發刊文提出「我們把『中國文化的獨特形態及其發展的過程』懸為今後史學研究的終極目標」，直至《新史學》簡單的表達為「能揭發真理，啟示人類，導引文明」，顯露出史學界的主流已逐漸由過去迫切運用學術干預時局的氛圍走出，不過仍未能走出、蘊育出新的學術，不然《新史學》為何言「希望藉著切磋、摸索，慢慢尋找出一條康莊大道」呢？從《新史學》發刊詞中的幾段話：「我們清晰地看到人類智識將引起革命性的改變」、「到二十一世紀，人類必另有一番新的世界觀」³⁸，民國初年知識分子積極入世的心聲多少仍是一直迴響至 1990 年的《新史學》的發刊。

近代東亞區域是多難的，政治時局常常左右了學術的發展。尤其兩岸對各自的學術常以政治、政策干預，使得政治逐漸鬆綁的 70 年代《史學評論》和解嚴以後的《新史學》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對學術的自主、紀律的看法。《史學評論》發刊辭中強調「實事論是的史學工作者」和「史學作品的價值最後還是為它本身的學術品質所決定」，《新史學》發刊文中指出「百餘年來依附在這兩大壁壘而締造的種種歷史觀，勢必紛紛修正」，均指出了臺灣史學入世甚深的困境。〈食貨復刊辭〉提及的「如何促使中國歷史從文學家的筆下走進社會科學的講壇之上」，至《史學評論》出刊的時候，史學已是籠罩西方學術的底下了³⁹。余英時在文中開始反省史學如何面對、接受西方學術的理論所出現的問題以及開出余自己的解決之道。《新史學》則乾脆把「探索歷史的真實和意義」定為史學的未來展望，把學術上的東西方歸為「形式」的問題，企圖以「史學是隨著時代社會而發展，具有揭發，啟示真理和導引文明」開出近現代史學的一個新方向。

取法西學是近代中國新史學的一個明顯特徵，有著長期的淵源⁴⁰，《思

社會各方面的問題具有深刻的責任感。」余英時著，沈志佳編，《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2004，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頁 151。

³⁷錢穆，〈新時代與新學術〉，《文化與教育》，1971，台北市：仙人掌出版社，頁 55。

³⁸〈發刊詞〉，《新史學》，頁 1。

³⁹余英時在〈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代發刊辭〉便寫到「時至今日，縱使是最守舊的史學家也不可能在他的所有著述和講論中完全避免西方式的概念和語言了。」頁 19。

⁴⁰羅志田，《近代中國史學十論》，2003，上海市：復旦大學出版，頁 115。

與言》在發刊文提醒「溫故可以知新」、「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許倬雲在其文章《改革與接受》⁴¹一文中也問：「究竟中國應該『全盤』接受外來的東西，而完全揚棄過去的文化遺產？」⁴²。轉眼十五年後，余英時便指出「史學家究竟需要那些方面的輔助知識是因人而異的，要看研究範圍的『切己』情況而定」⁴³。十一年後《新史學》已不再有「漸變與驟變二者」⁴⁴的考量，而是有類似錢穆在 1941 年所言「中國人與世界已共同面對此新學術之大使命」⁴⁵

三、結語：解嚴以後臺灣史學瑣碎化的一個「勢」

《思與言》的出版年份是在 1964 年，1949 年後的中國大陸史學幾乎一切事物均籠罩在馬克思唯物論中，而台灣則隨胡適和傅斯年一群人的到來而為中國傳統學問留下一片精神殘喘之地。中國近代的痛苦自 1840 年鴉片戰爭的槍聲開始，被迫面對超前近百年科技文明的歐美各國。中國史學與西方史學的面對面使得中國史學面對不曾有過的大變局，一方面是史學脫離經學的束縛，另一方面是西方學問明顯高於自身的衝擊。中國的近代化開始痛苦地、選擇性地接收歐美五百餘年以內的思想與技術⁴⁶。在接受了新的歷史觀之後，傳統的史學，已經不再被視為是真正的「史」。真正的史學，應該是能揭示歷史進化道理，展現社會進步的文明史、民族史。⁴⁷

《思與言》發刊詞中便鄭重的寫到：「唯有學術才是社會進步的動力」。陶希聖在《食貨復刊辭》呼籲的「採用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以致力中國歷史及社會研究的道路，迫切需要我們再拓寬，再延長。如何促使中國歷史學從文學家的筆下走進社會的講壇之上，就是我們應該解答的課題。」⁴⁸向歷史探求中國社會演變的軌跡，以印證並解答現代中國的問題。」便是陶

⁴¹許倬雲，〈改革與接受〉，《心路歷程》，1979，台北市：傳記文學出版，頁 95-101。

⁴²許倬雲，〈改革與接受〉，《心路歷程》，頁 100。

⁴³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代發刊辭〉，頁 13。

⁴⁴許倬雲，〈改革與接受〉，《心路歷程》，頁 99。

⁴⁵錢穆，〈新時代與新學術〉，《文化與教育》，1971，台北市：仙人掌出版社，頁 61。

⁴⁶「殊不知我們所謂『西學』，大概不過現代的思想與技術，絕大部份只在近五百年內發源於西方」。黃仁宇，〈新時代的歷史觀--西學為體，中學為用〉，1998，臺北市：臺灣商務出版，頁 4。

⁴⁷王晴佳，〈中國近代「新史學」的日本背景--清末的「史界革命」和日本的「文明史學」〉，《臺大歷史學報》2003 年 12 月，頁 234。

希聖外感時勢之需要，而欲自創闢一種新學問、新路徑⁴⁸。然而，就如余英時先生所言：「史學對我們可以有啟示、有昭戒，然而並不能直接為現實服務。」⁴⁹到了《新史學》的時候，則研究的角度不再是「多方面去認清中國文化的基本型態及其發展過程」⁵⁰和「照明我們今天的歷史處境」⁵¹，而是在「二十世紀以來中國或世界史學界所積累的問題」⁵²中「尋找出一條康莊大道」⁵³。

戰後的臺灣史學在 90 年代似乎企圖卓然自立與中、西之間，可是從《新史學》的發刊詞中「歷史家亦將自我解放，更自主、更客觀地了解歷史的本質和人類生存的目的」、「共同培養一種不斷追求歷史真實和意義的新風氣」這兩段話來看，它們背後的「歷史客觀性」其實仍是西方學術中知識論的預設，並未有所突破。《史學評論》和《新史學》的發刊詞中所欲言的問題，或許即如錢穆所言：「民國以來之中國人，一面即厭棄味失其自本自根之舊歷史，故一面雖面對新世界，而亦不能認識其真相。」⁵⁴

從臺灣自 80 年代開始的「本土化」至今的「去中國化」的一個「勢」來看，《新史學》的發刊詞或許是為了避免「中國意識」而把臺灣的史學工作者引向世界史學界所積累的問題，而不是臺灣史學已全面的達至中西文化完整匯流的形勢。1945 年 8 月 15 日，太平洋戰爭結束以後的臺灣人民面對現實中國裡醜陋的部分而對「中國的」產生厭惡⁵⁵，至 1970 年代中期以後逐漸產生國族認同的論述危機⁵⁶，使得臺灣島內學界的研究取向、風氣，隨著「中國意識」、「文化中國」和「臺灣意識」的意識型態權力消漲而產

⁴⁸錢穆在〈新時代與新學術〉一文中說到：學人在動亂的時代「外感時勢之需要，常能從自性自格創闢一種新學問，走上一條新路徑，以救時代之窮乏……」。

⁴⁹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代發刊辭〉，頁 6。

⁵⁰同上，頁 16。

⁵¹同上，頁 16。

⁵²〈發刊詞〉，《新史學》，頁 3。

⁵³同上，頁 3。

⁵⁴錢穆，〈新時代與新學術〉，《文化與教育》，1971，台北市：仙人掌出版社，頁 60。

⁵⁵陳恕先生的碩士論文〈從《民報》觀點看戰後初期(1945-1947)台灣的政治與社會〉中能看出戰後臺灣初期的本土人士和外省人士之間的各種隔閡與臺灣本土知識分子對中國大陸社會文化中醜陋部分的憤慨。〈從《民報》觀點看戰後初期(1945-1947)台灣的政治與社會〉，東海大學歷史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⁵⁶許順昇，〈流亡世代的政治構思：《民主評論》的國家論述(1949-1966)〉，東海大學歷史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 1。

生不同幅度的偏差、變化。

臺灣在國民黨數十年的教育下，五四新文學運動變成只是以「白話」代替「文言」的白話文運動，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內涵也降低為「西化」與「反傳統」，至於五四知識分子基於救亡所發展出來的強烈的現實主義關懷則完全被淡化了，甚至掩飾了⁵⁷。種種不同的因素使得戰後臺灣史學不單有民國以前在中國大陸上的學術包袱和挑戰，也有時代、政治變遷下額外產生的包袱和困擾。臺灣史學界中的研究益趨枝節化和瑣碎化，最後只剩抄史料這樣一副軀殼，卻美其名為「科學史學」⁵⁸的問題，這一點已有不少人指出。這方面或許又是一個史學和時代緊密貼近的一個例子：時代中的一些問題變得「不合時宜」⁵⁹，使得研究取材、範圍不得不轉向其餘的視角、史料而瑣碎化。最後，我想補充一點，陳寅恪曾言：「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此)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⁶⁰現今的學術體制化、泛民主化，所謂的「新問題」往往是指學術審查機制中所要推動的「問題」，而「新材料」則是在體制內的「升等」而被迫動手動腳找出來的「材料」，學術的體制化往往使得學者易於遷就現時的『政治適宜性』(political correctness)而曲解、掩蓋、甚至於牽強附會⁶¹。錢穆在〈新時代與新學術〉一文的結尾處，寫到「向內莫忽了自己誠實的痛癢的真血性，向外莫忽了民族國家生死存亡的真問題」⁶²或許是一個「切合時宜」的忠告。

⁵⁷ 呂正惠，〈現代主義在台灣--從文藝社會學的角度來考察〉，《戰後臺灣文學經驗》(臺北縣新店市：新地文學，1992)，頁 7-8。

⁵⁸ 彼得·柏克(Peter Burke)著，江政寬譯，《歷史學與社會理論》，2002，臺北市：麥田出版社，頁 10。

⁵⁹ 「大家都知道錢先生一生熱愛中國傳統文化，而今天的臺灣，不論在朝在野的主流人物，大多強調本土文化、無條件的接受西方文化，而排斥中國自己的傳統文化。所以在今天的臺灣，錢先生竟成了一位不合時宜的學人。」〈錢胡美琦女士致辭〉，《紀念錢穆先生逝世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出版，2001)。

⁶⁰ 陳寅恪：《陳垣〈敦煌劫餘錄〉序》，《金明館叢稿二編》，2009，北京市：三聯出版，236 頁。

⁶¹ 洪銘水，《臺灣文學散論--傳統與現代》，1999，臺北市：文津出版社，頁 12。

⁶² 錢穆，〈新時代與新學術〉，《文化與教育》，1971，台北市：仙人掌出版社，頁 62。